

木犁

■ 主编：袁良骏
阙国虬
■ 顾问：任继愈

【木犁书系◎风雨文丛】

王富仁

说说我自己

—— 王富仁学术随笔自选集

福建教育出版社

【木梨书系◎风雨文丛】

■——王富仁学术随笔自选集■

说说我自己

王富仁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说我自己: 王富仁学术随笔自选集/王富仁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0.4
(木犁书系·风雨文丛)
ISBN 7-5334-3002-6

I. 说… II. 王… III. 社会问题-研究-中国-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9430 号

木犁书系

总策划 阙国虬 黄旭

风雨文丛 主编 袁良骏 阙国虬

说说我自己

——王富仁学术随笔自选集

作 者 王富仁

丛书责编	黄旭 孙汉生
本册责编	黄旭
封面装帧	林小平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社长兼总编辑 阙国虬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印 刷	福建新华印刷厂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 350011)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198 千
插 页	4
版 次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300
书 号	ISBN 7-5334-3002-6/Z·73
定 价	18.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王富仁，1941年生，山东高唐人。196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197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主要著作有：《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王富仁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另有论文集5部、译著1部、散文集2部。

贈北京師範大學
圖書館

王守仁

二〇〇五年四月
十日

“木犁书系”缘起

20世纪是风云际会的岁月。共和国历经五十年风风雨雨，走到了世纪的交汇点。中国新文化更是步履维艰，行行重行行，辛苦探索近百年；中西的撞击，古今的流变，还有战争和革命的淬炼，无不带着撕裂的阵痛，而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深深的辙痕。

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蓦然回首风雨来时路，审视一行行曲曲折折的辙痕，望前路仍是沟沟坎坎，我们想起了木犁——这简易、笨拙而又凝重、厚实的农器，在我们的祖先歌哭其中的黄河两岸、长江流域荆棘丛生的广袤荒原上，犁出了一片片文明的处女地，从新石器时代以迄即将告别的世纪，中华文明的每一节进步，都饱含着一犁泥土的芬芳。

在这世界局势并不平静的世纪之交，我们尤其怀念木犁，怀念我们的先贤孔子师徒那段精彩的对话——孔子让诸弟子各言其志，颜回对曰：“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为农器，放牛马于源藪，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

基于这样美好的愿望，我们把正在编辑出版的几套命意相关的文丛合称为“木犁书系”。“木犁书系”首批推出的文丛有：

“野草文丛”，是一批活跃于当下文坛的杂文作家和鲁迅研究学者以读书札记、文化随笔的方式，对现今文化现象进行鲁迅式的审视和反思。

“风雨文丛”，是一批德高望重，极有影响的前辈学者（以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主）学术随笔自选集，或是对现当代文坛的风风雨雨作些梳理和反思，以鉴往知来；或是对作家、作品的评点；或是对文风、学风的思考；或是治学感怀。

“我思文丛”，选择45岁左右的最有实力的中青年人文学者90年代以来的优秀学术文章，集中展示其学术思想进步，可以预示下世纪中国学术的走向。

“首蓿文丛”（首蓿，旧时用来指称教馆的清苦生活），是一批教育学者心灵的散步，昭示的是源自教育使命感的闪电般发人深思的一击，有对中国现代教育命运的关注，有生命化了的教育实践的记录。教育工作者要么埋头于教学，要么潜心于专著，而此套关于教育的随笔却别开生面，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教育工作者的一份生命气蕴。

我们荣幸地邀请到当今文坛、教育界、学术界一批卓有建树的人士如邵燕祥、严家炎、吴小如、谢冕、钱理群、袁良骏、王富仁、顾明远、叶澜、黄克剑、赵汀阳、陈嘉映等先生加入了我们的耕耘队伍，他们笔健如犁，辛勤耕耘，在各自的领域拓荒不止，开垦出一片片长满创意的新田地。

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是，像木犁一样，一头插进生活的沃土，贴近人生，贴近教育，贴近学术文化，更贴近广大读书人，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田园。

我们期望，当你翻开“木犁书系”的每一页，都能得到一犁泥土的芬芳。

阙国虬 黄旭

1999年

“风雨文丛”献辞

献给您的是12位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耕耘“自己的园地”的著名学者的学术随笔自选集。他们从“五四”的历史氛围中走出来，把眼光投向远古的迷惘，又关注着眼下的变迁，从文学及于人生的诸多方面，自然有着深广的感慨和感悟。因其“学术”的因素，不免凝重和透辟；又因其取“随笔”的形式，自有着无拘无束的随意、轻灵以至于散淡。“散淡”也许是中国文人传统的一种极高境界，以悲悯之心，拥抱万千世界，乐山乐水，深入浅出，以“问”求“学”大而化之。

“五四”也许是20世纪留给中国人的最为丰厚的一笔遗产，因此，它也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说不尽的话题。我们将从辑在“风雨文丛”的12本书中听到他们的叩问和解读，也感受到他们的思索和困惑。其意义也许远不止于此。当我们跨入新世纪的门槛，回味着逝去的昨天，期待着明天的太阳，此时恰好听到了他们对历史的追问，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联想？

阙国虬

2000.5.10

目 录

1	自序
11	说说我自己
16	我的立场
22	我与“五四”
26	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时代，认识自己时代的文学
34	墙与门——文化杂谈之一
41	门与窗——文化杂谈之二
47	讨杂文檄——伪农先生《淡味斋随笔》序
54	中国文化的总主题——《文化与社会丛书》总序
57	走向独立过程中的中国文化
65	学科交叉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
74	中俄知识分子之差异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建设
83	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
92	围绕“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的学术论争
101	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批评话语

109	地域文学与民族文学——邓经武《20 世纪巴蜀文学》序
116	关于《20 世纪中国杂文史》的断想
122	文学“研究”与“文学”研究——马云 《叙事学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序
125	关于中国的比较文学
130	谈科幻小说
136	“涿涿之士”傅斯年
144	《徐忠平书法作品选集》序
148	梁实秋《雅舍》赏析
156	梁实秋《女人》赏析
163	自我的回顾与检查——《先驱者的形象》 自序
189	一颗渺小心灵的微弱蠕动——《文化与 文艺》自序
215	我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解读——《灵魂 的挣扎》自序
225	《历史的沉思》自序

257	蝉声与牛声——《蝉声与牛声》自序
260	韩文译本《鲁迅论集》序
265	我走过的路——《王富仁自选集》自序
277	《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后记

说说我自己·目

录

自序

中国的知识分子崇尚清高，这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较易做到的，而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极难极难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家里有几亩地的，读了书，当然愿意去做官，但实在做不上，或者能做上但厌恶官场的那些繁文缛节，也就可以不去做。家里的地有长工们种着，只用少量时间过问一下，多数时间还是自己看看书，写写字，画画画，与同类的读书人聊聊天，因为平时就不太关心钱的事和官的事，所以自己的诗里、文里、字里、画里，就没有世间的这些烟火气，通体的“清”，通体的“雅”，连骨头里都透着一股清香味。但到了我们这些现代知识分子这里就不行了。我们没有了“恒产”，也就

没有了“恒心”。文化成了一种职业，我们得靠它赚钱吃饭。虽然大家都感到文化需要独立，但从“五四”之后，独立的文化就已经不存在了。在这时，文化是与其它社会事业结合在一起的，是在其它社会事业的肌体内发育滋长的。它像一个寄生虫，得寄生在人家的躯体上，才能吸食到一点营养，得以求生和繁衍后代。因为它是寄生在别人躯体之上、吸食别人的营养而生长的，所以因所寄生的躯体的不同，彼此之间也就有了很大的差别，有了彼此不同的文体形式。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寄生在三个社会事业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它们也有各自不同的文体形式。这三个被寄生的社会事业一是教育，二是政治，三是经济。

我之所以把教育放在第一位，不是因为它比别的事业更重要，而是因为现代社会的文化首先是在教育这个肌体上生长起来的。好多人就把教育视为文化本身，实际上不是。教育是人的加工厂，人家把孩子送进学校，不是让你这些教师当文化试验品的，而是为了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能够找到工作、找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空间的。这是一个很实利的目的，与文化没有多大的关系，只是因为他们要在现代社会找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就得有点知识，有点文化。教师得把文化知识传授给他们，所以教育才与文化发生了关系。在这时，文化是为教育的实利目的服务的，不是实利目的是为文化发展服务的。从严格意义上说来，教师本身还不是文化人，不是知识分子，只是平常人所说的“教书匠”。但是，一个教师要教书，就要看书，看得多了，想得多了，再加上自己的人生经验，就有了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就有了不同于前人的新的知识。他认为这些知识也是

有利于人类、有利于学生的，也是可以通过学校教育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于是就有了表达的愿望。在这时，他就要写文章、写书，新的文化就在教育这个肌体上滋生出来了。在这时，这个教师才超越了自己的职业的限度，成了一个生产知识的知识分子，一个参与社会文化创造的文化人。但他的文化到底是在教育这个岗位上生产出来的，教育是传授知识和技能，是靠理性启迪的，是靠逻辑推理的。老师在课堂上不能作诗、写小说，而要讲道理。它不一定有趣，但一定要有用。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的《美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都可以在课堂上讲，虽然听起来很费力，但学生还是得听，因为从教师看来，这些对学生的知识的增长和未来的发展都是有用的。而学生为了长知识，为了拿学分，拿毕业证，尽管感到有些费力，也还是得努力听，努力记。这种方式移用到写作上，就成了学术论文。实际上，它是一个思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把人们需要掌握的知识或技能串起来，并且教授了思维的方法。我们通常把这种在学校教育的肌体上滋生出来的文化叫学院派文化，而学院派文化的文体形式就是学术论文或学术论著。

由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诸种矛盾，学院派教授往往看不起政治家，政治家也对学院派教授抱有很多的戒心，但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实际上，教师教出来的学生，是不能都留校当教授的，他们得分散到整个社会上去，而政治就是一项很大的事业，是任何一个社会也缺不了的。它同教育一样，也是一种职业。这种职业是从事社会的组织和管理的。一个政治家，不能饿着肚子管理各种公共事务，他也得因这份工作领到自己的一份报酬，一份工资。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还只

是一种社会事业，政治家还不是知识分子。但是，政治的组织和管理，也不能仅仅依靠口头命令，也得使用文化的手段。政治家要把自己的决定变成群众的行动，使群众不但能够按照自己的方针政策办，而且还要使他们乐意这样办，就得随时把自己的方针政策宣传出去，并且要加上必要的说明。这就有了政治文化。但是，政治文化到底是在政治这项特殊事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它就有自己的特点。学院派文化面对的是自己的学生，学生是未来才到社会上做事的。至于学生将来怎么做，一个教师是管不着也管不了的，他教给学生的只是足够的知识和思考、处理问题的办法（学院派称之为“方法论”）。政治则是现实性很强的事业，不论它会发展到何种抽象论述的高度，但它最终还要归结到“现在做什么、怎么做”上来，归结不到这个终点上来的，就成了学院派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等等学问了，而不再是现实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的本质是宣传，它的主要文体形式就是各种不同的宣传文字。它同学院派论文一样，也不一定是有趣的，但国民要遵从，就需要知道，需要理解。学院派文化与政治文化都不一定有趣，但要有用。因为有用，所以学生要学，国民要读，他们自己会主动费点力气。但学院派文化的有用在将来，在学生毕业之后，所以它说的不是现在做什么、怎么做，它告诉学生的只是一些知识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而政治文化的有用是当下的，是要具体去实行的，仅仅知道还不行，还得去做。做，有一个做法的问题，还有一个意志的问题。没有行动的措施，没有行动的意志，政治文化就成了政治口号，没有什么用了。

学院派文化和政治文化都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当

中到底隔着一层。学院派文化有国家的教育经费（它体现的是家长付给学校的教育费），政治文化有国家的管理经费（它体现的是公民付给国家管理机关的管理费），在一般的情况下不必同实业家直接打交道。社会文化就不行了。文学家、艺术家、编辑、记者是直接靠实业家的。实业家把文化变成了一种产业，一种赚钱的工具，知识分子心里常常不舒服。但要没有他们，这些社会知识分子就找不到混饭吃的门路了。所以，文化产业还是一种产业，文学家、艺术家、编辑、记者在现代社会实际上只是文化产业中的一些雇员，它首先是一种社会职业。但在这个职业里做事的“职工”们，却是一些没有任何先定的法权的。学院派教授有自己的学生，政治家有自己的国民；学生是要拿学分、拿毕业证的，国民是要取得自己的合法性、取得国家政权机关的保护的。我们现在常说“话语霸权”，这两种话语都有自己的霸权，只不过对象不同，并且在将来的更“进步”的社会里也是难免的。它们的文化产品多多少少都有点强制性，学生不读学术著作、国民不懂得国家的政策法令，自己是要吃亏的，但社会文化产品就不同了。一个读者不买一个作家的小说，一个观众不买一个剧团的戏票，这个作家和剧团没有一点咒念。他们得用自己的作品本身吸引读者或观众。他们吸引读者或观众的手段是什么呢？那就是“趣味”。“趣味”本身有高雅、低俗之分，但没有“趣味”却是不行的。有了“趣味”，人家才愿意看，才主动去买。买的人越多，实业家越能赚钱；实业家赚钱赚得越多，越能多出书，出好书。所以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社会文化得有趣、好读。学院派文化诉诸抽象理性，政治文化诉诸实践理性和行动意志，但理性和

意志对于人都有些沉重，而“趣味”主要是从感情中来的，不必动脑筋，不必下决心，轻轻松松地读下去，看下去，就被吸引住了。即使一部战争片，电影上打得难分难解，观众也不必自己研究战略方案，不用自己亲自参战，感情上很激动，思想上还是很轻松。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电影、电视等等所有这些属于文学艺术类的文体本质上都是社会文化的文体。

但是，在近年来的中国，“学术随笔”却兴盛了起来。那么，“学术随笔”又是一个什么玩意呢？它又是哪家的一种文体呢？它在近年来的中国为什么这么发达呢？

我原来就是一个学院派的教书匠。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写书的，说得冠冕堂皇一些就是“学术专著”。但到了80年代中期之后，我就写不出学术专著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整块的思想已经写完了。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中国的政治文化、学院派文化、社会文化一齐繁荣。中国的政治家要改革开放，要把自己新的政治方针宣传出去；文学艺术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在文化大革命前有很多经历、很多感触，是以前的文学艺术家所未曾表现过的，要通过他们自己的创作表现出来；我们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也有很多话要说，从1949年以后没有说清的一些道理都想说个明白。国民有政治热情，学生有学习热情，读者和观众也有情感体验的热情。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时非常的热闹。但没有多长时间，人们的热情就都转移到政治上去。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政治是个最庞大的结构。这个结构体是不那么容易变化的，不像学院派文化，昨天还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找出了很多的证